

# 血染灵山

## ——两位幸存者的忆述

□曹景广



团政委张咨明。

一营营长王子衡。

招远灵山矗立于招远西陲，海拔323米的山巅虽不算高耸，却见证着中华儿女的抗争史。

### 战前风云，山雨欲来

1939年11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十四团移防至此，团部驻扎在灵山西麓冯家村，三营驻守东麓西山王家村一带，二营驻守曲城村附近，成为胶东抗日的重要屏障。彼时，北海银行、抗大军校胶东分校、灵山采金局等众多军政机关分散驻扎在周边村落，灵山成为守护胶东抗战命脉的关键节点。

1940年6月，日军发动“六一”大扫荡，纠集多路日伪军，矛头直指灵山。战前，十四团团长李希孔竟临阵变节，潜往掖县向日军泄露驻防军情，致使我军陷入被动，抗战胜利后于潍坊被依法惩处。

5月31日，日军在朱桥南岭集结，十四团一营曾派30余人夜袭骚扰，拂晓安全返回，却未察觉敌军3000余人三路合围的险恶图谋。6月5日夜，一营再次袭扰敌营，返程后战士们正待用餐，一场生死决战已悄然逼近。

### 灵山鏖战，铁血阻击

6月6日凌晨，朱桥、掖城、黄县等多路日伪军携大炮、机枪、马队等，在灵山周边完成集结。黎明时分，南岭哨兵发现敌踪，团部紧急部署：一营营长王子衡率一连及半个三连（二连外出打麻雀战，三连半数留守北海银行）抢占灵山制高点；通信员火速通知机关转移，二营掩护团部北撤，三营在东侧打狙击。团政委张咨明、副团长宋子良亲率警卫连上山，决心死守灵山为转移争取时间。

清晨7时，枪炮声划破寂静。日军先以马队试探，遭战士两枪击退，随即以炮火覆盖山头，兵分两路围堵西南与南部，东面亦架起枪炮，形成合围。拥有丰富经验的王子衡与教导员刘一希见敌我力量悬殊，提议按游击战原则撤退，却遭宋子良否决：“没有我的命令，谁撤退就枪毙谁！”宋子良随即带警卫连抢占东南山头，张咨明则率部守着围子山山顶，阻击敌人的东侧攻势。

上午8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轮番攻打西坡，被战士们击退，半山腰尸横遍野。敌军随即合兵强攻东南山头，宋子良此时察觉难以支撑，想下令突围却已错过时机。北山的区中队因战力薄弱而失守，一营抽调一个排的兵力坚守至下午4时。张咨明见战局危急，命敌工站站长王理民带机密文件突围。王理民率20余人沿东麓沟潜行，最终成功抵达南孙家村，成为少数突围成功者。

王理民撤走后，张咨明在围子山凭险据守，多次击退东路日军。日军随即调整部署，增兵猛攻三连防守的东南山头。三连连长鲁光带领战士，在每人仅20发子弹、3颗手榴弹的情况下，连续打退三次进攻。弹尽粮绝后，战士们以石头御敌，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多杀鬼子为国尽忠”的呐喊中，鲁光与全排战士壮烈牺牲，宋子良亦在突围途中殒命于半山腰，其牺牲之英勇被幸存者铭记多年。

制高点失守后，日军机枪横扫各山头。突围中，刘一希与一连连长姜崇伦弹尽被围，敌人叫嚣“抓活的”，二人相拥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鬼子竟浇汽油焚尸，姜崇伦当场碳化。刘一希被老乡救下后，在剧痛中骂了三天三夜的鬼子，终因无医无药而牺牲。

时至正午十一时，日军再度发起围攻。此时我方战士已死伤过半，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剩余将士仍浴血奋战，予敌重创。副团长宋子良、三连连长鲁光及三连全排战士已在南部山头全部殉国，军需处长王吉山负重伤却依旧坚守阵地。仅剩的12名战士毅然冲入敌群，以枪托、大刀、石头乃至牙齿与敌人肉搏，终因寡不敌众相继倒下。

张咨明望着山下围困的敌军，深知突围已万分艰难，却不愿让剩余战士白白牺牲。他紧皱眉头，果断下令让重伤的王吉山带领大部分战士突围，王吉山急道：“你是政委，要保存党的文件，该你下！”张咨明厉声喝道：“啰唆什么！文件已妥善处理，快带战士们走！”

突围的突破口选在大韩家村东的源泉沟（又称“庵前沟”），张咨明率留下的战士掩护。王吉山带领战士们冲下山坡，却遭遇敌军五挺机枪封锁——韩家小山顶、东南山、石头谷、庵前沟北岸骷髅石、南岸土崖等，都在交叉火力的严控之下。战士们数次突围均告失败，伤亡惨重，被死死困在庵前沟的上游。彼时十四团装备匮乏，唯一的轻机枪在王吉山手中。子弹耗尽后，他将机枪沉入井中，转身欲攀爬崖壁夺取敌人机枪，却遭另一处敌人扫射，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其余战士中，部分侥幸冲出险境，在青纱帐的掩护下经洼子村、李格庄村向北撤退。

午后一点多钟，笔者13岁的哥哥从山后冯家村姥爷家返回曲城。行至石门沟时，遇见十余名满身泥土血迹、神色慌张、背着长枪的年轻人。打头的小伙子急问：“小同志，前边是



史前文化也称原始文化，是指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文化，即石器时代的文化。一般说来，在中国，史前文化是指夏朝之前的文化。由于夏朝之前没有文字的真实记载，所以对史前文化的考据只能根据文物遗迹作出历史判定。考古发现，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在牟平土地上繁衍生息，对这些遗迹的考古发掘，为我们展示了牟平的史前文化。

### 早期的贝丘文化

大海，是早期海洋文化的摇篮。生活在海边的原始人群，通过捕捞和采集，获取了丰富的食物资源，留下了大量的蛤、螺、牡蛎等贝壳及鱼类的刺、骨废弃物，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堆积如丘，考古学上把这类遗存叫作“贝丘遗址”。这些贝丘遗址，除了厚厚的贝壳，还埋藏着当时人类居住的房址、墓葬和各类生产、生活用具，形成了独具海洋特色的贝丘文化。牟平的气候受海洋调节，昼夜温差小、无霜期长、湿度大，陆生资源和海洋资源都十分丰富，非常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居住，因此，贝丘遗址较多。

牟平的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离海不远的丘岗高地，如蛤堆顶遗址、许家疃遗址、艳阳港遗址、大荆子崖遗址、蛎礁港遗址等。这些遗址与海岸线近似平行排列，形成了牟平早期的聚落群，生活在这里的先民，被称为“贝丘人”。文博工作者通过对贝丘遗址中规模较大的蛤堆顶遗址和蛎礁港遗址进行解剖发掘和科学考察，发现并了解了牟平贝丘人的生活状况。牟平贝丘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6000—5000年前，与中国考古史上的“大汶口文化”时代相近。

牟平的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离海不远的丘

岗高地，如蛤堆顶遗址、许家疃遗址、艳阳港遗址、大荆子崖遗址、蛎礁港遗址等。这些遗址与海岸线近似平行排列，形成了牟平早期的聚落群，生活在这里的先民，被称为“贝丘人”。文博工作者通过对贝丘遗址中规模较大的蛤堆顶遗址和蛎礁港遗址进行解剖发掘和科学考察，发现并了解了牟平贝丘人的生活状况。牟平贝丘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6000—5000年前，与中国考古史上的“大汶口文化”时代相近。

蛤堆顶遗址位于牟平区大窑街道蛤堆后村正南由东向西倾斜的一个台地上，东西长320米，南北长350米，总面积约18200平方米，是胶东半岛较大的一处贝丘遗址，也是环渤海环境考古的重要发现，是研究胶东半岛史前文化的重要资源，1979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蛤堆顶遗址现为农田，东部、北部略高，西部、南部略低，文化层厚1至2米。1979年3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烟台地区文管组曾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199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确认这是一处典型的贝丘遗址，遂于1995年10月进行了试掘，并在遗址范围内进行了钻孔勘探。

根据钻孔勘探，蛤堆顶遗址的人工遗物主

要是指石器、陶器和骨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灰褐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器型主要有圆锥形足鼎，带各种耳的罐、支脚和钵等。石器有石斧、石锤、石磨盘、石磨棒等。骨器有骨锥等。

蛤堆顶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贝类占大多数，此外还有鱼类和哺乳动物。贝类有多种

种类，如牡蛎、贻贝、文蛤、蛤仔、毛蚶等，鱼类有鱈鱼、红鳍东方鲀、黑鱈等，动物骨骼有猪獾、家猪、梅花鹿等。

根据研究，遗址附近的植物，乔木有冷杉属、桦木属、松属、桦属、胡桃属、栎属、椴属、榆属、杨属等；灌木及草本植物有榛属、蒿属、菊科、蓼科、伞形科、杜鹃科、禾本科等，蕨类及藻类植物有石松属、卷柏属、水龙骨科等。

蛤堆顶遗址

蛤堆顶遗址位于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姜格庄村东南的向阳坡地上，海拔20多米，1964年在整地改土时被发现。遗址中心在坡地最高处，向东1000米为驻马神山，南部边缘为一条西流的小河，北与黄海相距约5000米。遗址东西长540米，南北长56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

199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研究课题组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遗址文化层最厚处2米左右，内含大量的贝壳、兽骨、红烧土块等。在遗址南侧接近中部的断崖处，可见遗址的剖面。剖面划分为五层：第一层为耕土层，厚26厘米，浅黄色土，土质疏松；第二、三、四、五层均为含贝壳土层，但土层厚薄不一，含贝数量各不相同，第四、五层含贝量较少，第五层以下为黄色生土。

砾礁港遗址的遗物以陶片、石器、骨器为主。各类陶片中夹砂红褐陶最多，此外还有灰褐陶等。这些陶器纹饰简单，仅有泥突装饰，余皆素面。陶器均为手制，器形主要为鼎、罐、支脚等。各种陶器保存完整，造型优美，其他地方少见，极具文物价值。石器有斧、锤等。骨器有骨锥等。

砾礁港遗址中的动物遗存，主要是贝类和哺乳动物骨骼两大类。贝类有各种蛤、螺、牡蛎等，动物骨骼有猪、梅花鹿等。

砾礁港遗址面积较大，也是研究胶东半岛史前文化和环渤海环境考古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在对蛤堆顶遗址、砾礁港遗址的挖掘、考察中发现，当时牟平贝丘人的生产、生活已达一定的水平。

各遗址中都有不少红烧土块，一面为平面，另一面的断面上留有密集的成行排列的细圆木痕迹。据此分析，当时的房屋应该是一种木骨泥墙建筑，这些红烧土块应该是房屋被意外焚烧后泥墙倾倒留下的遗迹。这显示出当时人们的定居生活已经初具规模，构筑的房屋已经不是简单的窝棚，而是十分坚固的地上建筑，这说明贝丘人的居住条件是相当先进的。

贝丘遗址中发现了由长石英岩、云母变粒岩、云母片岩等天然石块略经加工而成的网坠和一些鱼骨，说明海洋捕捞已经成为贝丘人的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这些石网坠的出土地点，一面连接纵横的丘陵及茂密山林，一面毗邻大海。可能是人们就近从山林中取天然石块进行加工，再到沿海进行渔业生产活动。

从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鱼类骨骼中发现了红鳍东方鲀。这种河豚有剧毒，须先除去内脏和血液，冲洗干净，方可食用。可见贝丘人在当时就已经掌握了如何清除有毒部分后食用这种鱼的方法。

在许多贝丘遗址的地层中，都发现了动物

的残骨和炭化的榛、橡等植物的果实。可见狩猎和采集也是贝丘人的生存手段。贝丘人猎取禽兽后，除食用它们的肉外，还用它们的毛皮缝制衣物御寒，用它们的骨骼制作工具。同时，贝丘人还采集野生植物的根、茎、叶、果实，尝试作为食物。

遗址中发现了数量众多、形状各异的陶器，其制作与使用都能从侧面折射出贝丘人生产生活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也揭开了他们迈向新时代的新篇章。

石器依然是贝丘人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其质地、打制方法和用途不尽相同，可见在当时，贝丘人已经学会利用不同的石质和不同的加工方法制作不同用途的各类石器，做到因“石”制宜。

在距今约4000年前，延续约2000年的胶东贝丘文化开始消亡。据研究，在距今约6000年时，冰川融解，大量水流涌入海洋，胶东半岛附近的海平面比现在高4米左右。距今约4500年前，海水开始后退。而近3000年以来，海平面高度与现代相当，波动幅度较小。通过孢粉分析发现，当时的气候出现了由温暖湿润向寒冷干旱的明显转折。而生活在今天的贝丘人，正是处在这个转折期内。后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

址，考古工作者将其定为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

4000年前，胶东属于东夷，生活在原始社会会残酷的自然环境里，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东夷文化。这个文化的具体年代，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堪称最早的中国，是华夏文化的主流）为同一个时期，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这一文化最早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平度县东岳石村，所以史称岳石文化。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是这一文化的典型代表。

考古工作者先后对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进行了两次挖掘考察。

第一次是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烟台地区文管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28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成果。

发掘出土的器物里，夹砂陶以褐陶为主，

手制者居多，纹饰以附加堆纹为主，也有划

纹、载印纹等；泥质陶以灰陶最多，黑陶次之，

多为轮制，器表磨光，盛行突棱和子母口、空心

瓣形钮孔，纹饰以玄纹为主，彩绘装饰是其特

征。陶器器壁较厚，器形有罐、盆、尊、豆、器

盖等。石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细，通体琢制，

刃部锋利，讲求实用而不尚华丽。尤其是出

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石制农业生产用具，其中特

征最鲜明的有单面石刀石铲、半月形双孔石刀、

长方形多孔石铲等农具。石器也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种类数量更为繁多，磨制更为精细，主

要有骨铲、骨刀、骨匕、骨锥、骨针、骨鱼钩等，并且出现了有钻有灼的骨器（祭祀用的工具），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迈进

了文明的门槛。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

段完整的铜锥，表面锈蚀较重，剖面

近三棱形，尖部锋利，经鉴定化验为青铜

，是当时发现的世界历史上较早的金

属器。遗址所采集的标本，经碳十四测

定，距今约3600—3900年。

第二次发掘为2007—2008年。烟台市博物馆对照格庄遗址北部边缘进行了勘探发掘，又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首次在照格庄遗址上发现岳石文化与周代文化的叠压关系，将牟平周代文化的活动区域由城区扩大到照格庄遗址一带。1999年牟平顺正一夜城工地的考古发掘曾将牟平建城的历史由汉代提前到周代。

——在照格庄遗址首次发现岳石文化的窑址和壕沟，保存完好且密集，填补了该项考古空白。

——发掘出多个连续灰坑和直径在3米以上的硕大灰坑，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聚落状况、生活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采集了大量的木炭、兽骨、硅酸盐等标本。后续的实验室室内分析、测定、研究，为测定照格庄遗址的年代、生态环境、动植物分布、气候变迁等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可靠数据资料。

照格庄遗址发掘后，因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时代单纯，成为胶东岳石文化的典型代表，被学术界称为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照格庄遗址于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工作人员在牟平区发现了30多处岳石文化遗址，分别分布在沿海一线、烟台河沿岸、广河沿岸、沁水河沿岸、鱼鸟河沿岸、老清河沿岸、黄垒河沿岸等七个片区。南部昆嵛山腹地也发现了许多岳石文化遗址，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的主要特点是：

1. 农业水平有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中农业工具的比重加大。这充分证明粟作农业经济在当时已占主体地位。饲养业在当时也很发达，出土的兽骨中，被鉴定出的有猪、狗、鹿等动物，而且多为人工饲养的动物。这说明岳石人在进行早期渔猎活动的同时，已经把目光转向农业和饲养业，使经济形式更加多样化，以此来适应人口增长对物质的不断需求，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经济形态。

2. 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照格庄遗址出土的一枚长6.2厘米、直径0.5厘米的铜制铜锥，虽埋藏于地下3000多年，但锥尖仍不失锋利。这说明铜器在岳石文化中已经被普遍使用，人们对铜的性能、采集、冶炼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3. 岳石人已经有了很高的审美观。这一点除了表现在石器和骨器的精美制作之上，还特别表现在陶器尤其是泥质黑皮陶上。粗笨朴质的泥质黑皮陶，是最具岳石文化特色的陶器之一。其器形多为尊、罐、器盖、三足罐等，多饰弦纹、凸棱纹、子母口，器盖上有蘑菇钮，并有一定数量的彩绘，主要使用朱红和粉白两种颜色的矿料。

4. 文明程度已达到一定的高度。照格庄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卜骨，原料采用鹿、羊、猪等动物的肩胛骨，有灼有钻，钻孔排列比较整齐，说明这一时期的祭祀活动已经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lt;p